

《晨报》副刊《诗铎》与闻一多 朱湘等人



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

黄传会之卷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6 年在北京主编书店。次年《新月》月刊

两个人的真实故事

车子沿公路跑了十几分钟后，又拐上一条土路，路面坑坑洼洼，车子走走停停，最后，在一个大坑前彻底“抛锚”了，我们只得下车步行。

毛峪村是个三面环山，沟壑纵横的小山村。山上不见树木，到处是裸露的丑石，那地也好像是一块一块挂在山上似的。

一棵百年老槐树孤零零地站在村口，树叶稀疏，枯干龟裂，像一个被人遗忘的老人。

然而，当我们走进村口旁的小学时，心头禁不住为之一震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花园式的校园，造型别致的假山，五颜六色的花草和翠绿欲滴的冬青。教室里窗明几净，课桌椅配套齐全；学校还置有扩大器、收录机、电子琴和鼓号……

村小只有一名民办教师，他叫阎兆平。十八年来，他用自己无私的奉献精神，为贫穷的小山村带来了一缕阳光。

毛峪小学建于五十年代初，先后有三十二位教师(包括公办和民办)来此任教，皆因山村的偏僻、闭塞和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而相继离去。

一九七五年，初中毕业的阎兆平回到了村里。当时，他父亲已经托人在城里为他找了一个每月能挣五六十元钱的木工活。也正在这时，村小的那位老师由于离家太远调走了。村长找到了他：“兆平，咱村的学校亮台了，你看能不能来教？反正总不能眼看着下一代都当睁眼睛吧！”放弃了城里的木工活，真来当每月只有五元补助的民办教师？阎兆平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不过最后，他终于想通了，还打通了父母的思想，走上了讲台。

从此以后，学校成了他的家。

阎兆平是到三十三岁才结婚的,在农村这已经是晚得不能再晚了,原因就在他是民办教师,家境太穷。后来,乡亲们四处为他介绍对象,终于在邻村找到了一个姑娘。新婚第三天,他听说附近的学校夜晚被盗,越想越不放心,夜里,自己抱着被子住进了学校。新婚的妻子起了疑心,哭着问他:“你是不是看不中俺?”

民办教师,两头牵挂。校内有干不完的工作,家里有干不尽的活。但他心里的天平,总是倾向学校这一端。

一心扑在教学上,从早到晚备课,上课,批改作业,辅导学生,家访,勤工俭学等等,一切全由他一人张罗。

这里虽然只是一所村小,他也只是一名民办教师,但阎兆平却把要求定得高高的。一年级新生一入学,他除了教他们学习,还为他们洗脸、洗手、理发、灭虱,教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
阎兆平自己不懂音乐,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从小也能接受音乐教育,便抽时间,自己一个人对着歌片,一遍一遍地练唱。功夫不负苦心人,慢慢地,他掌握了基本的音乐理论,能自如地教音乐课了。他还组织了文艺演出队,逢年过节,为群众演出。家里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。只是,天长日久,总也有不理解的时候。一九九一年五月,久旱无雨,老父亲胃病发作,卧床一月不起。妻子除了抓药,照料病人,还得忙地里的活。那天下午,妻子背着孩子来到山上,她把孩子搁在地头,自己在地里拾掇玉米。忽然,传来了孩子的哭喊声,她跑过去一看,孩子从坝子上摔下来,额头上磕破了个口子。平常温顺的妻子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怨气,抱起孩子就往学校奔。见正在上课的阎兆平,把孩子往他怀里一塞,哭着说:“这个家你还要不要?有你这么狠心的爹吗?”老父亲也踉踉跄跄赶来了,指着头皮把他骂了一顿。夜里,躺在床上他思

前想后，一种深深的负疚感爬上了心头。是啊，这些年来，自己一心扑在学校上，顾不上照料家庭，对老人、对妻子、对孩子欠得太多了……

民办教师的待遇实在太低。开始，阎兆平每月只有五元的生活补助，后来，涨到十五元、二十三元、三十八元，现在也才只有七十五元。对家庭开支，一分钱他能掰成八瓣用；可对学校建设他却非常舍得。

那年，村里架电线，由于经费不足，村民们家里都通上电，小学却没通上。阎兆平想，学校要是通上电该多好啊，晚上学生可以上自习，装上扩音设备课间还可收听广播。他算了算，购买电表加电线需要近六百元。于是，动员家里把一头准备过年杀的猪卖了，拿出五百六十元为学校通了电。

一九八八年，他从家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准备买瓦翻修房子的七百元中，取出六百八十七元，为学校买了一架风琴。

一九八九年，为了教学方便，他自己又花二百七十元买了一台收录机，花二百五十元买了四十五盒磁带。不久，又用三百元购买了鼓乐、唢呐、笛子、二胡等文娱器材。

去年，他以个人的名义从信用社贷款五百元，给学校的文艺演出队买了一架电子琴。这回，父亲不愿意了，他对儿子说：“兆平，爹也不是个小气人，这些年你给学校办事，爹拦过你吗？可你也不看看咱们家那三间破草房，夏天遮不住雨，冬天挡不住风。你遭罪，老人和孩子也跟着遭罪。家里已经背了饥荒，这回你又贷款买琴，以后真想把媳妇卖了还债不成？”阎兆平依然还是那种策略，安抚了老人一番，又说：“爹，房子的事，我有数，日后找机会整修。”

辛勤的汗水，无私的奉献，换来了丰硕的成果。

这些年来,毛峪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、巩固率和升学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百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,他教的学生阎友才、张志国双双被团中央少工委评为“中国好少年”。

我们来到这位曾培养出五位大学生、四位中专生的民办教师的家。

山坡上,不少村民已经住进了砖瓦房,但阎兆平一家依然住着三间茅草房。中间是灶屋,东头老人住。阎兆平住的西头那间,土墙上已经裂了几道缝子,地面非常潮湿。

阎兆平全家五口人,种着六亩山地。地主要靠妻子和老父亲种。去年的收成是:一千一百斤小麦、一千斤地瓜干、一百斤大豆。

他的父亲悄悄告诉我,至今,他们家还欠着一千七百元的债。

我对阎兆平说:“什么时候也应该把这几间屋子修整一下了。”

他点了点头,说:“是啊……日后一定找机会。”

我们返回村小时,学校的鼓号队已经集合好了。

阎兆平和他的学生们以最隆重的仪式来欢送我们:

鼓号齐鸣,它在山间回响着,在我的心中回响着……

在采访中,我遇到了一些老民办教师,他们教了一辈子的书,盼星星盼月亮,就盼着能转为公办。可是,等到其他条件都符合时,年龄却超过了。平邑县教育局的高局长告诉我,去年,该县民转公时,就有十几位超龄的老民办。望着这些在山区的教育战线辛勤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教师,不能转正,当局长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但是,任何一项政策都是有条条框框,有一定的界线的。局里向上级反映了,后来,这些老民办自己也给中央写信,问题也没有解决。

左城崖村小的张如山老师也是这样的一名老民办。从一九六

四年初中毕业，开始在村小教民办，到一九九一年教龄整满二十七年。那年，正好有民转公的指标，张老师的条件也符合，乡里把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了他。表格都填了，最后却没批下来，原因是他的年龄超了八个月。

我们来到左城崖村小时，学生已经放学走了，张老师还在教室里批改作业。

今年五十三岁的张老师，看他那模样，却像是六十多岁的人。

张老师有六个孩子，两个女儿已经出嫁，现在家里还有六口人。人口多，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。前年欠了二百元的债，去年欠了七百元。

我问：“今年欠吗？”

张老师叹了口气，“大儿子十月成亲，今年更得欠！”

“这儿结婚一般需要多少钱？”

“这个没有准，家庭好些的，如要盖新房子，一两万，两三万，也是它。”

我说：“那最低标准呢？”

张老师说：“房子我们绝对是盖不起了，旧房子凑合着住。订个亲，办喜事时再稍稍应酬一下，最少也得一千五百元。就这一千五百元，就把我愁死了。”

这时，一旁的乡中心小学的李校长插话说：“我们这些民办教师实在是太苦了，长期是一个人盯着一个班，家里的地照顾不过来，平时连病都不敢生。”

我本来是不想再提起转正的事的，怕对张老师刺激，可禁苇住又提了：“李校长，像张老师这样的以后还有转正的机会吗”李校长摇了摇头：“恐怕没有了。”

这时，张老师说：“说实在的，现在想起这件事来，心头还不

是滋味。不过,我也想通了,上级也有上级的难处,那么些民办老师想转,总是有人要被卡下来。真要怨,只能怨自己命不好吧,我要是晚出生八个月,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?”

李校长说:“不是你命不好,是咱们国家太穷。要是国家富裕些,我看,所有的民办教师都应该转为公办教师。”

张老师又说:“前些日子,有人看我日子过得紧巴,要介绍我到城里一个建筑队去看大门,每天给五块钱,我笑了笑,没答应。我走了没人教孩子先不说,咱教了一辈子书,现在去给人家看大门算什么?咱再穷,这点骨气还是有的。”

张老师平静地说着,我却想了很多很多……

第二章 从乌蒙山到赤水河

贵阳到黔西六盘水市的五七一次列车是一趟慢车。作家也好,记者也好,领导干部也好,如果想多了解一些民情,不妨乘几回慢车。

每站必停。驶出贵阳不久,便有大批的背着箩筐、扛着整麻袋干辣椒的农民拥进车厢。他们用一种难懂的土语在进行交流,车厢变成了临时的“农贸市场”。

同行的《中国青年报》摄影记者解海龙,不时地用他那鹰一般的双眼扫描着四周,并不时地举起相机“咔嚓”几下。

中午,车过安顺,我们到餐车用餐。吃着吃着,解海龙突然放下了筷子。这时候,只见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儿从过道穿过,他的胸前挂着一串空可乐瓶,脸上、身上满是煤灰。海龙说了声“我去看看”,便抓起相机尾随而去。显然,他又发现目标了。

我也站了起来,穿过拥挤的人群,好不容易在八、九车厢的

连接处发现了他们。男孩靠着车门。两眼望着窗外；海龙一边问着什么，一边摆弄着手中的相机。

海龙小声告诉我，他叫年小红，今年十三岁，家住紫云县板凳村。村里穷，父亲常年在外打临工，母亲改嫁，他从小随爷爷、奶奶过。去年，爷爷、奶奶相继去世，他便开始了流浪生活，每天在火车上混，在车站睡，靠拣瓶子卖钱。

我问他：“小红，你上过学吗？”

年小红摇了摇头。

“为什么不上？”

他瞥了我一眼，“没得钱，连饭都吃不饱，怎么上？”

“村里其他孩子能上学吗？”

“有的能上，有的上不了。”说罢，他侧过脸，用木然的目光望着窗外。

忽地，年小红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像鱼一般溜走了。

我曾经想过，这次到贵州能不能撇开那个“苦”字，在其他地方多做些文章？然而，年小红帮我拉开的这次贵州之行的序幕，却已经是够沉重的……

十月十三日

六盘水市辖六枝特区、盘县和水城县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，其中煤炭保有储量达一百五十亿吨以上，占贵州省的三分之一，有“黔西煤海”、“高原煤都”之称。

水城县是国家级贫困县。全县六十三万人，一九八八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七元，按县委书记话说。只能买只不能下蛋的小母鸡”。去年全县财政收入一千三百八十万元，至今仍有十一万人生活在极贫困线下(人均收入不到一百元，全年粮食不到三百斤)。

全县一半乡不通电话，一多半乡没有电。去年，失学儿童高达两万多人，其中女童的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四点八。

车到坪子村后拐上了一条小公路，说是公路其实只是一条机耕道。吉普车像一位患了哮喘病的老人，不住地喘着粗气，费力地爬着。好不容易翻过山梁，下坡时车轮又老是打滑。开开停停，八里山路折腾了一个半小时。

到丫口田村，前面连机耕道也没了，只得步行。而这时，雨却越下越大。走前，疏忽了，我们都没带雨具。钟副县长让司机到村里去借几把雨伞。过了片刻，司机回来了，说是找遍全村，就找到这把破伞和这块塑料布。过去有句老话，说贵州是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”，今天都让我感受到了。

我们只好是两人同撑一把雨伞，三人共顶一块塑料布，继续前行。

中午，才到丫口田村。

走进半山坡的村小，静悄悄的，连一点声息儿都没有，我们以为是中午放学休息。这时候，有人发现在一间教室的土墙上用粉笔写着一则《通知》：“经研究，决定放农忙假三天。”嘿，情况不明，白跑一趟了。

问一位村民，村小的老师有没有住在本村的。村民说，三位老师家都在外村，他们都回家种地去了。我们只得往回走，刚走了几步，那位村民又追了上来，说：“你们不是要看学校吗？村里还有一个学校，是私人自己办的。”

“还有私人学校？”我觉得有些奇怪，“咱们去看看！”

村民在前头带路，走不多远，便隐隐约约传来一阵读书声。顺着声音。我们来到一家农户前，只见三四十个孩子坐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，正由老师领着在背课文。

老师发现了我们一行，忙从屋内迎了出来。有人指着钟副县长对老师说：“他是县长，看你来了。”那位老师一听说来了县长，既激动又有些拘束，两手都不知放哪好。

老师作了自我介绍，他叫向荣祥，今年四十一岁，原为村小的公办老师，因违反计划生育，超生，一九九。年被除名回家。村小只有三间破旧的教室，只能招三个班的学生。到了五、六年级就要翻山越岭到外村上。家长不放心，孩子们也不愿走。这样，好些孩子只好在家呆着。前年秋季，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，向荣祥在自己家办了这所私人学校。

我问：“你现在招了多少学生？”

向荣祥说：“五年级、六年级各一个班，一共是四十三名学生。”

“你的报酬是谁给的？”

“这主要靠收学生的学杂费，本学期五年级每生收十一元六，六年级每生收十二元七，一共是五百来元。也有个别交不起的，就交点粮食。”

“教学的内容是不是同公办的学校一样？”我又问。

“完全一样，我都是按教学大纲教的。”

“学生的成绩呢？”

“去年暑期毕业了十一人，八人考上初中；今年毕业十六人，考上十人。成绩在片区算好的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向荣祥又说：“隔壁村也有一处私人小学，听说全县这样的学校有几十处。”

我问钟副县长对这种“新私塾”的看法。他说：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。水城穷，按国家标准规定，全县还缺小学校舍十五万平方米，政府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，只好去调动各种积极因素。”

雨还在下着，离开丫口田村，我们又往新发村赶。

据介绍这也是个穷村，全村年人均收入只有五六十元。进了村，果然见村民们住的几乎都是茅草房。

村小的陶继红老师因家里没房子就住在学校里。见我们来，忙说：“外头下雨，进屋坐，进屋坐！”

进了教室旁他那间黑古隆咚的屋子，连一张凳子都没有。锅灶就在屋里，借着微弱的火光，好像锅内正煮着一些梨片。我想：可能是家里谁感冒咳嗽，熬点儿梨水喝。

我问他的妻子：“正熬梨水啊？”

他妻子听不懂我的话。陶继红说：“不是梨水，那里面煮的是土豆片。”

“你们每天都吃这个？”

陶继红点了点头。

见我们都站在那里，他又说：“坐呀，你们坐呀！”忽地，他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，屋里没有凳子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唉，这屋里没凳子，走，大家到教室去坐。”

新发村小学有三位教师，四个班级、七十名学生。三位教师中两人属民办，一人是代课。

陶继红今年二十九岁，一九八六年初中毕业后，留在村小当民办教师。他家三口人，去年责任地收了三百斤包谷、一千斤土豆。差五百多斤口粮，得自己去买。每月八十元工资，四十元国家给，基本能拿到；另四十元乡里补，经常拿不到。他告诉我们，这里的村民穷，好些学生交不起书本费、学杂费。

我问：“交不起怎么办？”

陶继红说：“学生交不起，老师用工资垫。这学期报名七十人，四十五人没交费，我们两个民办老师被扣了三个月的工资。”

省青基会副秘书长陈通问：“这些年，你一共为学生代垫了多少学费？”

陶继红想了想，答：“从八六年到现在，大约不下一千元吧。像三年级的陈学贵同学，父亲是个残疾人，母亲又疯了，这几年的学费都是我代垫的；祝正光、祝正中两兄弟，也是几年没交了……”

“你工资本来就少，还得替学生代垫学费，家里的日子怎么过？”我又问。

陶继红笑了：“什么样的条件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们家从来不吃油，只有到过春节才称两三斤肉吃。”

这时候，我突然发现陶继红身上穿着一件旧呢子半长大衣，紫红色，卡腰，从颜色和样子看，显然是女式的。我觉得有些奇怪，便问了句：“陶老师，你这件大衣……”

陶继红有些尴尬地说：“前些日子，山东莱州市焦家小学的徐维本老师，从报上看到我们这里还很穷，给寄来了一大包衣服。那些小的，我都分给了学生。这件大的，学生不能穿，今天下雨，冷得实在顶不住，刚才找出来先穿了。”

我只觉得心头一酸，一时，不知该说什么好……

十月十四日

“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”。在乌蒙山区采访，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毛泽东著名的诗句。在伟人的眼中，气势磅礴的乌蒙山，不过像滚动着的小泥团，不足为惧；然而，在我们凡人的脚下，每一座陡峭的山峰都显得格外的具体。

大山，给人类传播文明设置了重重障碍。

这是一次事先并没作安排的采访。

我们准备去红岩乡窑上村石板沟小学，吉普车却在陡箐乡的新营村抛了锚。司机在修车时，我发现公路旁一个小山岗上有几间砖房子，心想，那儿一定是一处小学。于是便拉上陈通往小山岗走。

上山一看，果然是新营村的村小。

一位正在上课的男老师见了我们，忙从教室里出来，一边敬烟，一边说：“两位领导来了，怎么乡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？”

陈通说：“我们不是什么领导。车子经过这里，这位北京客人想来看看。”

男老师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到办公室坐坐吧。”

进了那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办公室，男老师为难地说：“这里连水都没得。”

男老师自我介绍他叫李顺尧，已经当了十一年民办了。现在学校有四十一名学生，一、二、三三个年级三个班。他教二、三两个年级，另外一位女老师教一年级。

“现在每月工资拿多少？”我问他。

李顺尧笑了：“每月四十二元，我今年四十二岁，正好是一岁一元钱。八三年刚教书时，每月十六元；八五年二十元；八七年三十元；前年涨到四十二元。有人说，民办教师加工资比老牛拉破车还慢。”

这时，那位年轻的女教师走了进来，她见我们在说话，正想退出，我把她叫住了：“老师别走，一起聊聊嘛。”

陈通问她：“老师，你贵姓？在这里教了几年了？”

李顺尧代她回答：“她叫李惠，九〇年初中毕业后，在我们这里代课。”

陈通又问：“都是本村的吧？”

李惠点了点头。

我问李顺尧：“家里生活过的怎样？”

李顺尧说：“恼火得很！”

恼火，应该是恼怒而发火的意思，用恼火来形容生活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陈通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解释说，贵州人所谓的恼火，包含着麻烦、困难、问题严重的意思。

陈通说：“李老师，你说说咋恼火吧？”

“家里人口多，粮食不够吃；前几年盖房屋该了一千多元债，还没还……”

我问李惠：“小李老师，你们家的情况怎样？”

李惠看了李顺尧一眼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是我爸爸。”

没想到他们是一家人。

李顺尧告诉我们，这个学校原来有个姓潘的民办教师，教了七年书，每月工资三十六元五，他家的生活又特恼火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，一九九〇年终于走了。

“到哪儿？”

“到铁路上去看道口，每个月值半个月班，工资五十多元。当时有人劝我也走……最后，我还是留下了。”

“那又为什么不走？”

李顺尧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见潘老师一走，我也动心了，觉得在哪干也比当民办好，便跑去找村长。村长说，是苦了你们这些当老师的，可是，潘老师走了，你再走，孩子们咋办？想想也是，老师们都走了，谁来教学生？这么些孩子没学上，良心过不去，咬咬牙又坚持了下来。看来，这辈子我只有教书的命了。”

“你自己当也就当了，为什么还让女儿也来当老师？”

“老潘一走，一时找不到人教。正好李惠初中毕业，家里再供

不起她上高中，我让她来了。现在，李惠拿的是潘老师的工资，每月三十六元五。”

本想到他们家看看，李顺尧说到他们家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，没时间了。他们父女俩每天早上八点到校，为节约时间，中午不回家吃饭，就在校改作业，下午放学再回家。

父女俩一直把我们送到山岗下，并一再叮嘱我们有机会再来……

吉普车修好了，但朝前开了十来公里，山里却又起了雾。白色的雾团从四面八方同时合拢来，山峰被遮住了，公路被遮住了，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模糊。

司机不得不打开大灯，不停地鸣着喇叭，像小脚老太太似的一步一步往前挪动。

终于到了红岩乡窑上村石板沟。那迷蒙的雾团又变成了细细的雨丝。

这是个苗、汉混居的小自然村，全村三十一家农户，一百五十三人。村民告诉我们，去年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四十元，粮食只有二百斤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又问了一遍，他们肯定地回答只有这个数。

石板沟小学只有一名叫王大钢的教师，教一、二年级两个班四十四名学生。

让人怎么也不敢相信的是村口的那间破败的小草房，竟然就是村小唯一的教室。我们低头走进草房里，只见房顶已破了几个大洞，土墙也裂了几道缝隙，地上还留有几个小土墩。暑假里一场大雨过后，地基塌陷，草房开始倾斜。实在是不能再让孩子们在里头上课了。

王大钢四处呼吁，八方求援。村里人多地少，盖教室到哪儿

去找宅基地?最后,他主动提出把自己家最好的半亩责任田无偿贡献出来盖教室。终于感动了上帝,县里、乡里,各给了一些钱,村民们自己出劳力,现在,三间新教室正在施工之中。

王大钢自己也住在一间草房子里。这也算是一个家:三块石头架着一口锅,一小罐盐巴就搁在地下;没有一个柜子,几件破旧的衣服搭在一根竹杆子上;地上的一块塑料布堆着几团破棉絮,那是他们用来睡觉的“床”……

王老师今年二十九岁,一九八三年念到初中二年级,家里再没经济力量了,便回村小当民办。教了十年,现在每月拿三十五元。这里实行苗语和汉语双语教学,教师要懂两种语言才行。

山区苦,山里的孩子也苦。

王大钢说:“你们去看过那间小草屋,打我当民办起就在那里教。没有课桌椅,学生坐在土墩子上,书本就摆在腿上。寒冬腊月,孩子们几乎都是打赤脚,一边上课,一边冻得直哆嗦。”

村小的学生,每学期书本费加学杂费一共不到十五元。这学期四十几名学生,才收了一百来元。不够的由老师工资顶,王大钢教了十年书,已经替学生代垫了两千多元。

村里还有二十多个孩子由于家庭贫困而上不了学。

村民王中富,六个孩子只有一个上学。

越是贫穷,越是超生。村民王中友,一共生了七个孩子,前六个都是女孩儿,直到第七个生了儿子,才满足了,才不生了。

这些无辜的贫苦的小山民们,从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天起,便汇入了文盲大军的行列之中。

临别时,我为王大钢在他的那间草房前拍了一张像,这是一帧山区教师的清贫图……

十月十五日

纳雍县县城不大,但比起我前年到西北采访所见到的县城要热闹一些。蔬菜、水果、小商品摆得满街都是,女人们穿的也似乎要鲜亮一些。

车子在嘈杂的人群中慢慢地往前拱着。路旁的一条醒目的大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:“一胎上环,二胎结扎,三胎又引(产)又扎,四胎又引又扎又罚。”我禁不住“噗哧”一笑。在农村,我发现这些计划生育的口号都提得既生动又具体,让人一目了然。那天,在一个乡,有一条针对结扎对象的标语也非常通俗:“思想通了,主动来;半通不通,动员来;思想不通,强制来;逃跑了承包土地收回来。”

同此相比,一些关于教育的口号便显得逊色。比如,见到最多的像:“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”、“百年大计,教育为本。”它仅仅是告诉人们教育的重要,而缺少一些非常明了的、具体的措施。

在县城匆匆吃了点东西,我们又忙着往乐昭镇太阳坡村赶。

据介绍,太阳坡教学点的老民办教师杨照群,一九五八年初师毕业,作为公办教师分到董地小学。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被下放,从此后,公办变成了民办,一直在村小教书,今年已经五十五岁。

车子在一条河边停下,司机喊了几嗓子,一位十三四岁的姑娘摇着一条船,把我们接过了岸。

穿过一片竹林和一块红薯地,便是杨老师的家。

遗憾的是杨老师不在家,他的老伴刘开珍告诉我们:杨老师去乡教办开会去了。